

July 1992

Occasional Paper No. 14



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

葉漢明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

葉漢明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兼任加州大學歷史系Teaching Fellow及研究助理、加大亞美研究中心研究員多年。現職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師，講授中國現代史、史學方法等科。研究重心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地方史、婦女史及華僑史。撰有關於中國及香港婦女史研究、明清及近代中國地方社會經濟變遷、美國華工、華僑會黨與國共關係等論著，並任《性別研究資訊》編輯委員。

©1992葉漢明

ISBN 962-441-014-3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史與中國婦女研究

一. “年鑑學派”與社會史研究

西方的中國婦女社會史是一門發展中的學問，其產生可溯源自歷史學本身的變革、社會史和婦女史的更新、以及中國婦女研究的興起。首先，社會史的出現與歷史學在本世紀中的變革有密切的關係。1929年，法國的L. Febvre和M. Bloch創辦了*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期刊。這個期刊的出版有兩重意義：第一，它標誌著對歷史研究有突破性和深遠影響的“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的誕生。第二，它標誌著現代社會史學的產生。“年鑑學派”的出現可說是對十九世紀實証主義史學的一種叛逆。在實証史學的影響下，史學研究只局限於狹隘的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領域，偏重人物的描寫和事件的鋪陳，強於敘述而缺乏分析，這些弱點在二十世紀初已暴露無遺，造成所謂史學危機。“年鑑學派”就是因應拓闊史學領域和開展歷史綜合研究的時代需要而出現的。*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創刊號的《告讀者》一文就呼籲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結合起來，在綜合研究中推動歷史學的更新發展。Febvre和

Bloch更提出“總體歷史”(Total history)的概念，強調歷史學家不應狹隘地、片面地理解歷史的內容，而應從深廣的時空去考察人類歷史演變的各種複雜形式。他們的研究也超越傳統政治史的局限，注意社會階級的衝突，物價、人口、農業經營方式以至農村生活史等社會經濟史內容(姚，1988：37-38；周，1984，Iggers，1985：43-79；Bloch，1965)。

“年鑑學派”第一代所開拓的社會史園地要到二次大戰後才迅速擴張。四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可說是“年鑑學派”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學派的第二代大師F. Braudel繼承了第一代的綜合歷史思想，重申把人類過去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重要性，進而指出歷史的縱深性和層次性，提出一套新的時空理論，使史學方法論系統化。他認為每一種事物都通過時間和空間在一種緩慢的運動中產生出歷史，歷史學應與其他社會科學交流，以揭示地理環境、思想傳統、風格習慣等在長時段起作用的歷史現象(Braudel，1980)。“年鑑學派”的影響在五十年代已超越法國，而研究社會史的風氣也在英、美等地逐漸盛行。其中英國的“新社會史學派”影響尤大。這派的代表人物E.J. Hobsbawm和E.P. Thompson批判以G.M. Trevelyan(1942)為代表的“舊社會史學派”過份排斥政治史、經濟史，只重生活方式、閒暇狀況、宗教價值等內容，致使社會史研究流於淺薄、狹隘和瑣碎。⁽¹⁾“新社會史學派”的研究視角更多地集中在階級社會群體和群體意識的心理結構上，以此說明“現代化”或“工業化”等社會變革和社會運動。他們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反對將階級作“靜態分析”，主張把階級放在整個社會的“關係體系”之中作動態的考察。他們也力圖揭示那些無能力表達自己、無文獻記載、常被忽略的社會下層小人物的文化心理(Stern，1956：423)。Hobsbawm的 *Primitive Rebels* (Hobsbawm，1959)和Thomp-

son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hompson, 1963) 是這個學派的典範著作。在1952年創辦的*Past and Present*期刊正是這個學派發表他們學術觀點的陣地。

在美國方面，五十年代末期，已有八所大學開設社會史課程（石，1986：97）。1958年創辦的*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就是一份專門性的社會史期刊。到了六十年代，美國又出版了*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期刊。英國有兩所大學也在1968年初度開設社會史課程（石，1986：97）。另一方面，法國“年鑑學派”在六十年代末進入了第三階段，新一代的學者如Le Roy Ladurie、Le Goff等的創新觀念衝擊著歐美甚至日本的史學界（Le Roy Ladurie, 1978, 1981；Le Goff & Nora, 1985；沈、宋，1983）。量化方法的應用、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提倡、心態史的開拓、以及政治結構、符號和權力關係的分析等都成為七十年代西方史學的發展趨勢。如果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社會史偏重人口與家族血緣關係、社會運動、階級和社會團體、集體意識、城市、社會變遷等問題的研究，七十年代以後，由於新科技的發展和不斷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方法，社會史的研究範圍更廣，課題越來越精細而多樣化（蔡，1988：3）。*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一類的期刊也應運而生。

總括而言，自從“年鑑學派”開啟社會史的系統化研究後，這門學問的內容愈趨龐雜，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可以是社會生活、社會本身的歷史、個人或社會集團成員的經驗、社會關係、社會結構大變動中普通人的經歷、或全面的歷史（蔡、孫，1989：88-90）。正如P. Burke所說：社會史的定義可以是社會關係的歷史、社會結構的歷史、日常生活的歷史、私生活的歷史、社會和諧與社會衝突的歷史、社會階級的歷史、既互相分離又互相依賴的社會團體的歷史等等

(Burke, 1980: 31)。二次大戰之後，新科技發展刺激了歷史研究工具的更新，如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採用促進了量化史學的發展，社會科學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的革命也導致史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領域的拓寬，以及新概念、模式的採用(蔡、孫，1989: 93-94)。在這種趨勢下，社會史的內容更加豐富，課題激增。七十年代初Hobsbawm曾把社會史的研究課題概括成人口和家庭血緣關係、城市史、階級和社會團體、心智、集體意識或文化的歷史性研究、社會變遷、社會運動或社會反抗現象等方面(Hobsbawm, 1971)。到了八十年代，P.N. Stern總結所得的社會史課題牽涉面更廣，包括犯罪史、性史、閒暇、教育、少數民族史、健康社會史、死亡史及婦女史等(蔡，1988: 42)。

二. “新社會史”與婦女史

在社會史研究不斷開展的影響下，婦女史吸收了新社會史在理論和方法上所強調的從社會底層由下而上看歷史、突出普通人的行動和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運用其他社會學科的概念分析說明史料，以及在傳統的文獻資料之外，利用實地調查的方式，發掘、蒐集特藏檔案、口述紀錄等，以求窮盡可資利用的資料，對有關問題作整體性、全面性的了解。在新社會史的影響下，七十年代的婦女史學者一反以往婦女史研究中注重著名傑出婦女的偏向，開始將研究對象轉向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無名婦女。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婦女解放運動也使史學界受到嚴重衝擊，而激起女性主義史學的勃興。這場婦女解放運動被稱為“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和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早期女權運動不同，六、七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在範圍和目標上已遠遠超出旨在爭取婦女選舉

權的“女權運動第一次浪潮”。二十世紀初開始的女權運動在二十年代隨著婦女取得選舉權而歸於沉寂，但婦女在法律上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地位終於在六、七十年代成為“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所針對的中心問題。廣大婦女強烈要求表達和體現自己的意志，要求自決、解放，要求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影響所及，以男性中心的價值觀為基礎的學術界也備受攻擊，歷史學也因此而受到衝擊（榮，1986：74）。

本來，婦女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環，其興起和發展都和婦女解放運動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初，隨著當時女權運動的逐步高漲，婦女史曾出現過一次短暫的高潮；二十年代婦女在法律上贏得選舉權後，婦女史研究和婦女解放運動便同時進入低谷。二次大戰後，婦女史研究才重新崛起。在六十年代末期的美國及其後的歐洲和其他國家中，史學界興起了一股“婦女史熱”。美國是婦女史研究發展最早並最為活躍的國家。重要的婦女史期刊如*Feminist Studies*，*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等均在美國出版。1970年，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首次舉行了婦女史討論會。據統計，美國全國各學術刊物每年發表的婦女史論文由七十年代初的五篇劇增至八十年代初的一一二篇。由美國帶起的婦女史研究熱潮在七十年代迅速擴展至歐洲和亞洲，其中以英國和日本的發展最為觸目。到了八十年代，婦女史已受到國際史學界的重視。1980年第15屆國際歷史學大會上，婦女史首次成為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與會代表並就歐亞各地婦女史研究的概況和婦女史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這次會議標誌著婦女史已發展成為當代史學的一個專門領域（榮，1986：74）。

綜觀七十年代以來世界婦女史研究的發展，可見在內容

方面已超越婦女參政運動史的政治史範圍，而向婦女社會活動策略、女性友誼、家庭生活、性、生育、勞動、教育、甚至戰爭等新課題開展。可見研究者愈來愈注意普通婦女的生活和意識，從而使婦女史納入“新社會史”的範疇。

在研究方法上，社會史所採用的量化技術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法也日益為婦女史學者所重視。方法的改進令史料的範圍擴大，例如實地調查和採訪方法的廣泛採用，使口述材料和實際生活體驗的紀錄成為文獻資料之外的重要史料。史料的多樣化令重建後的歷史內容更為豐富，也令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加強。

在理論方面，婦女史一方面受到英國的“新社會史”學派對階級的動態分析和對社會低下層異化感的探討所影響，而產生了以婦女受壓迫的物質與經濟形式為研究對象以進行理論建構的學派（馬，1987）。另一方面，重視文化心理深層分析的社會史流派，和女性主義思想中強調婦女主體性和獨立意識的一支配合，向婦女史研究中那種視婦女為被壓迫者的傳統觀念挑戰。這派學者主張把婦女視作推動歷史前進的一種積極力量，而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試圖以這種新的價值觀來描繪婦女在歷史上的形象，重新評價婦女在歷史上的角色、地位和作用，重新認識婦女成長和爭取解放的歷程（榮，1986：74）。

三. 西方的中國婦女研究

重視文化心理和婦女主動性的婦女史學派最先影響當代西方學者對中國婦女的研究。1972年，美國人類學家M. Wolf出版*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一書，提出以婦女為研究中國家庭制度的中心，扭轉過去偏重男子佔主導

地位的家長制或族長制的研究偏向。她的“母性社會”模式說明在以男性為主的傳統中國家庭中婦女如何巧妙地行使她的有限權力，並指出婦女權力隨著年齡和環境發生變化，例如婦女力量在結婚時最弱，在作母親後轉強。Wolf的分析還涉及中國婦女在家庭之外的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權力（Wolf，1972）。在Wolf所帶出的研究新方向的影響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中國婦女問題的交流日增。1975年Wolf和歷史學者R. Witke所合編的*Women in Chinese Society*就是一項跨學科研究的成果（Wolf & Witke，1975）。這些研究有口述歷史方式的，也有人類學式的實地調查，比過往單靠文字資料研究父權社會實在進步得多。因為有關婦女生活、工作和角色問題的資料一向受到忽視，甚少留下文字記錄，要研究婦女社會史，就必須在史料方面另闢蹊徑。

“年鑑學派”的Febvre曾說：“沒有書面史料，也可以而且應通過其他方面來再現歷史，……人所有的、為人服務的、標誌人的存在、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東西，都可以利用”（馬，1987：283）。人類學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式的實地考察和採訪方法是蒐集非文字資料、再現“寂寂無聞”的民眾生活的重要途徑。Wolf等學者由於長期直接接觸被研究對象，故能仔細體察她們的生活周期。人類學所強調的從被研究者的角度看問題的原則，更令Wolf的研究有從中國婦女觀點看她們的自身、家庭和社會的特色，從而打破許多對中國婦女的既定看法，造成對學術界的衝擊。可見材料的性質和方法的運用對所研究問題的解釋和研究的成果有肯定的影響。

然而，進行人類學式的調查採訪必須有一定的條件，Wolf在七十年代對中國婦女研究有所突破，主要由於有機會在台灣作長期研究。台灣和香港也成為探討中國社會和婦女

問題的其他學者如N. Diamond, R. Gallin, L. Kung, M. Jaschok, E. Johnson, J. Salaff, A. Sankar, R. Watson等的研究據點，課題包括婦女與家族、奴婢制度、女性社群、婦女勞動者、婦女與社會變遷等（Diamond, 1979: 317-340; Gallin, 1984; Kung, 1981; Jaschok, 1988; Johnson, 1975; Salaff, 1981; Sankar, 1978; Watson, 1986）。但如果研究對象是中國大陸的婦女，就要視乎大陸的開放程度。這正是中國婦女研究在近十年開放政策實施期間才漸趨蓬勃的原因。即使在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期，不少學者仍以香港為研究駐點，以移居國外的前大陸居民為訪問對象，或索性只根據官方資料，作政策上的分析而已。例如最早研究中國婦女地位變化的學者W.L. Parish和M.K. Whyte，就曾以香港的大陸移民為訪問對象，對1949年後中國城鄉社會的變遷作研究，兼及婦女地位的轉變。他們先後在1978和1984年出版了*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及*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二書。在婦女問題方面，Parish和Whyte以社會學的角度，對婦女在城鄉的經濟地位、參政程度、家庭生活等課題作1949年前後的比較分析，基本上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婦女地位已有所提高，而城市婦女在保健設施和工資待遇及福利方面，比農村婦女受益較多。但他們也指出，在社會變遷中，婦女也付出一定的代價，傳統中國婦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的有限權力趨於式微，而家庭之外的“婦女共同體”也瓦解了。當今中國婦女肩負著職業和家庭的“雙重負擔”，沒有傳統社會中婦女所享有的勞動之餘的閑暇。此外，社會主義改革所未能解決的問題或所引發的新問題如官僚主義、低水平生產等肯定影響城鄉生活的質素（Parish & Whyte, 1978; Whyte & Parish, 1984）。

Parish和Whyte二書的局限性主要在資料方面，他們雖採

用了社會科學常用的採訪方法，也注意到被訪者的代表性問題，但他們訪問的基本對象是離開了大陸的移民，例如*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書的主要資料是來自1977-78年在香港訪問的133個前大陸各地的城市居民。和人類學的長期性參與觀察式的實地調查成果相比，Parish和Whyte的研究便不夠直接。

這種資料的隔閡性毛病也出現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幾本有關中國婦女的社會學專著上。1983年同時面世的*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K.A. Johnson 著），*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J. Stacey 著）及*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P. Andors 著）（Johnson, 1983；Stacey, 1983；Andors, 1983）都以對中共婦女政策的分析為立論基礎，未能採用社會史的直接和深入的研究法，以探討婦女的切身經驗和感受。她們比較重視理論，例如 J. Stacey 就是一個持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觀點的社會學家。和 Parish 及 Whyte 相比，Stacey、Johnson 和 Andors 的觀點更具批判性，對社會主義下的婦女解放程度感到不滿。Stacey 認為中國的歷次政治變革都不過是引進新形式的父系制度。Johnson 指出傳統家庭制度的主要特徵依然存在，因此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力量不夠強大。Andors 更將1949年以來的中國婦女史稱為“未完成的解放”。這三本批判性著述的同時出現肯定對當代中國婦女研究產生一定的震撼力。然而，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批判中共政策的同時，這三位學者卻過份倚重官方文件的報導，似乎認為中共的政策和政治運動頗能反映社會實況。其實不少政治運動的真正目的不能純從有關文件的字面上理解。例如批林批孔運動中攻擊壓迫婦女的封建思想，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可能是攻擊周恩來，為江青奪權鋪路。

過份偏重官方政策和政治運動的分析，而忽略真實具體的社會情況的探討也是這三本著述受到批評的地方。深受人類學方法論影響的歷史學者E. Honig就指出，Stacey、Johnson和Andors的書中所嚴重欠缺的正是活生生的婦女人物和故事，故未能透過研究對象的經歷和感受對社會生活和群眾態度作深層的分析。Honig進一步認為忽略婦女的實例分析不僅是個研究重點問題，也是個理論問題，因為Stacey、Johnson和Andors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批判中共政策的同時，無意間將婦女描述為此等政策的被動受害者。似乎由於婦女對政策的“欣然接受”，她們不僅無意消除性別的不平等，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助長不平等現象的延續（Honig，1985）。這樣，婦女不僅是個受害者，同時也要為她們所受的壓迫負部分責任。雖然責備這批頗為激進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有“倒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論點，實在太不公平，但重視實地調查的社會史學者認為人類學者如M. Wolf所發掘的証據，已顯示中國婦女和世界各地的婦女一樣，有其生存和維持既有權力的策略，而且在壓迫性的社會結構下，也能創出各種反抗的方式。只要我們重視婦女的主體性、獨立性，把她們視為主動人物而非被動受害者，有關問題將可從嶄新的角度去理解，新材料和新方法的應用也有助於新問題的發掘和新理論的建構。

其實，在社會學者仍以香港的大陸移民為主要資料提供者的同時，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已在中國未完全開放的困難下開始進入大陸作實地調查。七十年代末期進入中國的學者有M. Wolf、E. Honig、E. Croll等。Croll在1981年出版的*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就以實地考察印証了1950年婚姻法所保障的自由婚姻在農村未能廣泛實行（Croll，1981）。Wolf在1985年出版的*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lf, 1985), 是繼她在七十年代實地考察台灣婦女後深入研究內地婦女的力作。在題目和結論方面, Wolf和Andors的*Unfinished Liberation*都有相似之處。Wolf的研究顯示社會主義和父權制度可以同時並存。但在研究方法方面, Wolf所用的是一貫的駐地參與觀察和長期採訪。在堅持從被訪者的角度看問題和重視口述材料和當事人的經驗方面, Wolf再為人類學和社會史提供了參攷的典範。

不過, 對民間材料的過份偏重和對官方資料的過份懷疑, 也令Wolf的研究有矯枉過正之弊。Wolf的資料是在1980-81年間在兩個鄉村四個城市蒐集的, 當時中國剛開放不久, 實地採訪仍有許多限制, 例如官方對調查地點的指定、對被訪者的篩選、陪行人員的安排等。為了盡量減少偏差, Wolf堅持在每個地點所訪問的五十個婦女中不包括幹部在內, 目的在避免官方的政治性的干擾。然而經過官方篩選的被訪者, 即使不是幹部, 也難以肯定是“非政治性的”, 何況中國是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拒絕訪問女幹部也可能帶來一定的損失, 畢竟婦女幹部也是女性的一類, 研究價值絕不低於普通女性。而且婦女幹部可能更能認識官方政策背後的意義。探求真象的方法不在排斥某類被訪者, 而在於採訪技巧和問題的發掘方式。

近年來, 人類學者呼籲對學科本身的知識來源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檢察, 留意訪者和被訪者個人偏見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提高採訪的技術(Geertz, 1988; Marcus & Fischer, 1986)。最近一位年青的美國人類學者J.E. Stockard所寫的*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書中就詳細討論到發問技巧的重要性。這本探討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華南社會“不落家”婚俗的新書，可說是人類學者研究歷史的一個嘗試。和一般人類學者一樣，作者本以當代社會為研究對象。她的原來研究計劃是當代香港城市的婚姻和勞動模式，但因訪問齋堂和安老院的老婦時，發現她們不願多談自己的經濟現況，反而對自己在廣東故鄉的經濟和婚姻生活津津樂道，從她們的談話中，作者發現“不落家”婚俗的普遍性，遂引起研究珠江三角洲農村社會史的興趣，因而進入華南地區作實地調查，訪問了珠江三角洲七十多條村約一百五十多個老婦，重建數十年前華南的婚俗模式和婦女的經濟策略（Stockard, 1989）。本書似偏重經濟對婚姻的決定性，認為“不落家”與華南絲業有一定的關係，而未能對這種婚俗的非經濟性文化因素作獨立的探討。但在以人類學方法用於社會史研究方面，本書提供了另一個可行的範例。

1984年出版的*Lives: Chinese Working Women*，就是運用實地採訪的方法發掘、蒐集中國婦女的生活史資料，再配合回憶錄式的文字材料所編成的中國勞動婦女集體傳記，為婦女社會史提供了豐富的生動材料。書中詳細介紹了口述和傳記材料的性質、形式及處理方法，以及實地調查的甘苦經驗，其中對發掘、蒐集和應用各種資料以重建生活史的方法（作者稱之為Life History Method），討論尤為詳盡，極富啟發性（Sheridan & Salaff, 1984）。

四. 西方的中國婦女社會史

至於歷史學者採用人類學方法從事社會史和婦女史研究的成果，在八十年代中期和後期已開始出現。同在1986年出版的兩本“姊妹作”——E. Honig的*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和 G.

Hershatter的*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肯定是這方面的典範著作。這兩本書以實地調查和口述歷史的方法發掘材料，配合檔案、報刊、解放前的勞工調查、社會改革家和政治組織家的報告、工廠紀錄等文獻資料，豐富了工運史的內容（Honig，1986；Hershatter，1986）。八十年代中國的進一步開放不僅令Honig和Hershatter能在上海和天津直接進行實地採訪，而且讓她們接觸地方檔案資料，這些特有的口述和文獻材料使她們對津滬二市的歷史研究更為深入，成就超越前人。例如Lieberthal較早時對天津的研究，就只能依靠難民的訪問資料（Lieberthal，1980）。

作為社會史一環的工運史，曾因E.P. Thompson的研究而在理論、方法和內容方面有所更新，脫離以工運事件為中心的政治史領域而進入以工人和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的關係為中心的社會史範疇。Thompson指出工人階級在對抗資本主義擴張時毫不被動。他認為工人在其階級形成的過程中一直扮演一個主動的角色。不過，在強調工人階級意識和組織時，Thompson似未能顧及其他因素，尤其是工人階級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針對這方面，今後工運史的研究者在繼承“新社會史”學派的遺產時，還要進一步擴大視野，將工人的歷史視作資本主義制度下眾階級歷史的一部分。換言之，工人階級的歷史要和更廣闊的社會史結合起來。Hershatter和Honig的研究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進行的。她們和Thompson一樣，重視工人的主動性和自我意識，強調從工人的角度看工廠生活。另一方面，她們也注意到工人的政治生活，以及他們和其他社會團體的關係。Hershatter更將罷工行動視為工人的生存策略之一，並強調工運組織者與工人間的互動關係。

Honig和Hershatter的工人社會史不僅令我們對工人或婦女工人的生活有實際的認識，也糾正了一些既定的看法。以

往的工運史多集中討論現代化工廠工人的問題，Honig和Hershatter的研究卻指出工匠、手工業者等傳統工人的大量存在及其重要性（Hershatter，1983；Honig，1983；Shaffer，1983；陳，1986）。根據工運史的一個正統觀點，工人的貧困和受壓迫的程度與其抗爭性成正比。但Honig據檔案資料和對工人的訪問指出情況的歧異性和複雜性。例如工人內部的分化嚴重影響其團結程度，其中地緣性的分歧、工人本身的流動性等均影響其階級意識的形成。帝國主義的衝擊也不可一概而論。部分工人可能認為日本紗廠比中國紗廠工資更高，工作條件較好，而有非愛國主義式的實利取向。面對帝國主義的存在，工人可能更為分化，而非一致地團結對外反抗。Honig對二十年代上海女工的研究正顯示出這種分化現象。情況比較一致的是幫會的影響。Honig蒐集所得的文獻資料和口述証供都一致指出青幫對上海控制力之大。事實上，勞資雙方均受幫會的壓迫。對工人而言，黑社會的威脅比資本家的剝削更令他們恐懼（Honig，1986：6-7）。

Honig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女工，而Hershatter卻從實地考察發現天津紗廠中甚少女工，故以一般紗廠工人為研究對象，但也指出婦女在“散作制度”下從事手工業勞動的重要性。她更特別強調，散作制和家庭女工的存在，顯示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並非直線式的。大工廠未能完全取代舊式生產制；家庭生產可與工廠生產並存。前者其實助長了後者的發展（Hershatter，1986：3）。至於Honig對上海紗廠女工的研究，也揭示出不少鮮為人知的工運面相，其中尤以工運中婦女的角色為重要。和以往一般的印象不同，Honig的上海女工在二十年代甚少參與激進的工會組織，更少加入共產黨，也沒有女工成為工運領袖。她的資料顯示，直到四十年代，情況才有所逆轉。二次大戰後上海的工運不僅有紗廠女工參